

# 清議

第 二 卷 第 六 期

社 論

這是甚麼經濟政策？

專 論

談政治脫節

鮮 葉

三論我國經濟問題中的心理因素

楊 桂 和

亞洲安全與對日和約

彭 文 凱

經濟管制問題

李 鵬 天

論今後財源的籌措

甘 士 杰

南方氣候與中國種族

楊 文 輝 譯

文 藝

巴爾札克的葛利奧爸爸(續完)

何 欣 譯

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清 議 月 刊 社 出 版

上海廣元路雲裳村二號  
南京藍家莊三十六號之五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及滬行 上海寧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南京西路 愚園路 林森中路 八仙橋 提籃橋  
虹口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無錫 蘇州  
常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 中國旅行社

電話：一三四五〇號轉接各組  
地址：四川中路四二一〇號  
本社業務一覽

承辦國內外貨運行李業務，代客報關，代理保險等。  
發售國內鐵路客票，預定車位、鋪位。  
發售國內機票船票，預定機位船位。  
發售國外及香港輪船、飛機客票，辦理國外聯運，預定  
座位，代換行程，代客申請外匯，領售銀行旅行支票  
等。  
代理郵電業務，經售旅行雜誌及刊物，代售印花、郵票  
等。

請訂閱

全國唯一金融經濟專門性日報

# 金融日報

上海金  
融市場  
每日銀根張弛詳情，華股外  
股公債市況，外匯及內匯市  
場動態，國家銀行及商業行  
莊業務，報導最詳細，數字  
最可靠。

上海商  
品市場  
分食物，燃料，衣着，建築  
材料，日用品，出口品，化  
學品，文化品等八大類，行  
情最正確，敘述最清楚。  
進出口管制法令，出口物資  
產銷情形，進口貨物運銷情  
形，英美及香港市場介紹，  
內容豐富，不厭求詳。

上海工  
業新聞  
全國工業協會函電公告，上  
海工業協會函電公告，各廠  
商設備及出品介紹，工業消  
息，搜羅最翔盡。

金融消息迅速正確  
經濟新聞特別詳細  
每日清晨專差遞送  
工商各界不可不看

社址：上海九江路一〇五號 電話：一四三三  
發行所：上海九江路三三號

# 社 論

## 這是甚麼經濟政策？

月餘來各地經濟的發展，真使得我們學經濟的人有點「莫明其妙」了！我們要問：「這是甚麼經濟政策？想要製造甚麼經濟制度？」

上期本刊社論是：「經濟重點政策質疑」，那時候我們認為政府所推行的經濟管制，還是不脫所謂「重點政策」，就是分派大員到全國主要都市，去監視和督導，目的不外想以幾個重點城市管制的成功，以期穩定經濟。當時我們說，我們對於這種政策，是抱相當疑慮的。可是，時至今日我們覺得政府並不是實行我們想像中的「重點政策」；由各方面的情形發展看起來，我們真不知道當局是否還有經濟政策，假定說有，我們真不知道這是甚麼政策？究竟當局想要製造甚麼經濟制度？我們說這種話，是有事實作根據的。

要說是為建立新的穩定幣制，那麼何以大量發出金圓券而始終沒有回籠的辦法？難道說當局不知道最簡單的通貨數量說？經過十二年通貨膨脹的社會，改換幣制也不是一次了，一紙法令上寫着「金圓」就能取信於人民嗎？我想當局應不致如是。但是，事實上竟與原來想法相反，兌換金鈔還不夠，還要平空添上輔幣風潮。

要說是在平衡財政呢，實際上政府的開支是增加了，雖然士兵公教人員的待遇仍然不堪維持。增加稅收嗎？如何可以在產業停頓的局面下求得？而為了維持限價政府不惜支出大批補貼，仍舊隨意的利用印刷機政策。這豈是政府「自我整飭」「嚴守預算」的作風？

要說是為維持限價呢，也不見得；上海方面較好，其他地區都早已放棄了這種政策。廣東和西南各省不談，就是福建，漢口，也是改行了議價。天津北平更是開放了限價，據說天津麵粉價格在限價時黑市超過五倍，而且不易購得，現在開放了，反而落到三倍左右，供應增多不少。假定當局還承認物價在地區間有其一定的比例，那麼像這種甲地不管乙地，乙地不管丙地的辦法，如何能期望維持限價呢？

說到上海，有使我們不甚瞭解的幾點：

(1) 行政效率在上海做得最澈底，無論「打虎」工作以及檢查工作，都是做得最有聲有色的，但是結果是百物絕跡，購買困難。雖然報上每天登載着主管當局頻頻開會，認為一切無問題，可是，缺乏現象仍然存在，人民的衣食都漸漸發生了問題。我們不知道還是「打虎」工作不夠呢？還是檢查不嚴呢？還是其中

另有經濟因素？

(2) 看報載，說蔣經國氏要改造中國社會經濟，對這點我們本來很寄予希望與同情的。但是時光一天天過去，我們也看不見蔣先生有具體的改革方案拿出來。他說上海之現狀必須打破，這情形倒有點像，但是我們還未看到他的新的替代辦法，他說過：「人民最低限度之生活必須維持，工廠之生產必須令其繼續。」但是，要做到這兩點，也並不簡易。

(3) 行將實行的配給辦法，我們很替它就心。第一，種類包括米、煤、布、糖等五種，配給對象為工人、公教人員、貧民，至其他人民則發給准購證。以過去都市配糧成績而論，其成就當然不可抹殺，但是有一點值得重視的，即假定配米一旦停止，則其對於物價的影響，必屬不堪想像。這也就是管制經濟一管上手，就非繼續下去不可的。當局此次擴大配給種類，是否對於「繼續」這點研究過？假定沒有把握「繼續」，我們覺得還是以不卒然與辦為宜，免得維持了一時，貽害將來。

第二，講配給必須能供應無缺，否則無異「惹火燒身」。假定人民手裏拿到准購證而買不到東西，那就無異政府信用又打了一次折扣。因為人民總以為有證必能買到的。

第三，准購似乎是在限量，限制消費，其實也不盡然。根據民調會的統計，過去上海每人耗米每月〇·六一二斗，即尚不足一斗，但自從配米實行以後，每人都是一斗，按理應無缺米現象，但實際則相反。此亦可以證明配給制度本身有其浪費性，因為按人平均的辦法本身即是浪費的，假定全國都如此平均計算，恐怕根本不能實行配給，因為我國大多數人民的消費量本是低於配給量的；除非當局有力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否則談配給無異是「自尋苦惱」。

第四，限價准購實行的結果，必然使上海主要物品的消費需

要量大增，人口增多，政府供應物品一天天感到壓力。各地物品不會自然流入上海的，勢必要當局以物易物，而以物易物辦法在國內也是一種不經濟的辦法，製造貪污，擴大政府機構，並且破壞正常工商機構。僅僅為維持五百萬人口的「最低生活」，是否值得作這樣大的犧牲呢？我們覺得當局應該考慮。

最後，談談生產問題。當局似乎以為必要時政府可以接辦工廠，使生產不致停頓。國營工廠當然是可以的，但國營並不能解決生產問題，中紡公司不是也有困難嗎？許多國營事業是否真能增加生產呢？老實說，靠信用膨脹來支持的國營生產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可以繼續增高的，否則根本就不會發生通貨膨脹問題。

經濟上的問題，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單純，需要瞭解其間運行的法則。任何一種經濟政策，如果沒有力量建立一個新的經濟體系，就應該面對事實，隨着經濟法則作適當的調整，否則，那不是一站在雲端裏說話」嗎！

歡 迎

投 稿 !

歡 迎

批 評 !

# 專論

## 談政治脫節

鮮葉

各自為政，是今日政治上的通病，不必諱言。門羅主義，行之於美國，尚且不可，行之於中國，怎成！

老百姓要太平，當兵納糧，太麻煩，希望就業和安靜。政府要一統華夷，士劣豪門利益，必須保護，圖個熱鬧。各走各的路，越走越遠。當政者，不注意調和民意，人民和政府脫了一大節。

中央政府確很努力，搜集年高德劭的十九世紀思想家，配合各種洋博士，東翻西閱，會議連年，草定計劃，通令實行，效果如何，概不問。地方政府，特別是縣政府，奉到中樞命令，未嘗不想澈底執行，無奈，土劣奸商，盤居議會，開口就是：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缺一不可。縣長征兵，土劣子弟，理應例外，換言之，在國法不抵天理和所謂「人情」時，始能存在。征收營業稅，照商人的「人情觀」，絕對不能征。筆者親耳聽一位學界前輩說：「縣政府用錢，要我們商人捐獻則可，不能強征營業稅。」這是什麼糊塗話，還是不折不扣的事實，元老和洋博士，決想不到，所以中央法令和地方的實情脫了節。再以考核而論，幾時中央考核過各省市的政績？編組保甲，清查戶口，政令班班，而地方渺渺，從未聞：因為戶口未查清，而省主席被撤了差，可是戶口查了幾十年，還是查不清，不知是誰的責任！國大會和總統府，是怎個關係，誰也鬧不清，憑粗

淺的認識：國大對通過憲法增列臨時條款和選舉總統舉了手，政事沒有過問，也沒有堅持什麼意見，各代表獲得支薪的勝利，勉強可以維持生活。總統可以直率的發布命令，有時送交立法院追認一番，簡單明瞭。

從法理方面看：立法最權威，立委人數，也很可觀，不愧集天下之英才，說是民選，實際——立委們也承認——不能代表民意——脫節。我們不否認立法者的地位很難，要顧政府，又要顧人民，正因為如此，才要慎重，才要絕對客觀，不要自居太上皇，祇管立法，不管執行上的困難；如預算案，立法院求紙面上收支平衡，對議入沒給辦法，對歲出削了一刀，「天不下錢，地不長錢」，一個最合理的財產稅案，遲到如今，尚無下文，硬叫行政院嚴守預算，天呀！印鈔機又該偏勞。立法院要客觀，完全重視政院的困難，也是不對。如增加文武職人員待遇案，若覺得錢包裏有錢，而又覺得實有增加的必要，儘可決議增加，倘政院畏難，改組政院可也。真正民主國家，立法操住錢袋，行政祇能作執行技術的考慮。今日立法院，既不能改組政院，又不能放手使政院作事，死路一條。司法喊獨立，死抱住幾本舊法典，津津引用，大有滋味，試問與實在民情，切不切合，司法者明白，立法者明白，但是：各自為政，誰也不想多事，監察權泛而無當，又過於超然，向何處負責，準保沒人知道。考試更別開生面，專辦考銓，照準舊本法規

，閉眼去做，高考及格，硬性分發，另一方面，大量裁員，節省經費。為什麼行政考試聯不起來，那個能想通。

學者倡：三權分立，並不是各自獨立，三權制衡，並不是各自為政，三權尚不能明瞭，五權更難清楚，無話可說。

各機關不相聯繫，最為清楚。地政部的土地登記。地政局資料，地政局資料，又憑原始登記，其實張三李四，不知轉了幾轉，已經距離事實很遠。此為上級與下級機關的小脫節，還不算數。農林部能參照地政部的不正確資料，已經算難能可貴，當查詢地政部資料時，政地部不肯欣然把資料交給它。到處表現各自為政味道。再以征遺產稅說：法院受理繼承訴訟，不問已否繳納遺產稅，地政局辦理產權登記，也更不問，不但有資料，問它：為何沒有？它會說：「沒有就是沒有，」意思說：「你管不着。」這樣的脫節，始終沒想出辦法來，怎辦公事，天曉得。

上級機關的用處，是指揮監督下級機關；姑不論指揮，就連監督也做不到！請看：各「部」「會」有不是家天下的嗎？「部」的好壞，從工友到政策，全由部長負責，難怪部長把部務看成了家務，於是裙帶風，貪污風，推拖風，吹牛風，風行一時，有眼有耳的人都曉

得。院方洞明白，但是決沒管過。表示「宰相肚裏能行船，」不屑管。專看各部會的精裝報告，漂亮就成。講究人事關係，某人是條子人物，不好意思。「部」務優劣，向來不考核，部報告說：「本年築路十萬八千里，」院方無條件承認，一定是十萬八千里，而且助築為虛的盲目宣傳；其實，築路八千里不到，路寬六尺有零，黃土路面，雨後泥沙，通車一輛，是用人力推行的。支付經費，可是按市價與報告完全相符。誰問這些囉嗦事。大家作官，何必與人為難，況且大人不問小事，部長本也自居為大官，大官有把握：不能因少修幾百里路，和少開幾輛汽車而撤職。是路局的事，管它！至於旅客方便，貨物其流，那是紙面的名詞，寫報告時，用得着，平常，決不適用。上級不能切實監督下級機關，正是上下級機關脫節的主因。

許多脫節現象，來源於黨務和軍事的脫節。黨不同，黨見不一，黨團之分，派系之別，層出不窮，各立門戶，互助不足，互制有餘，結果，力量抵消，浸透在行政方面，便成了互不問問，互相摩擦……真要命。

軍隊有中央雜牌兩種，軍官有黃埔、陸大、軍校、老保定、日本士官，什麼講武堂、行伍等等名堂，不論才幹，同用同學，先期拉後期，結成小組織，水火不相容，甲軍官帶的兵，乙軍官不能帶，軍隊私有，高級統帥，不能指揮，脫了節。所以每戰必敗，抗戰期如此，今日還是如此，最可怕的是：軍人兼政和干政，就更不堪設想，不單是脫節了事，簡直是大破壞，至於不可收拾。

從縱橫前後各剖面觀察，我們的政治處處脫了節，原因固然很多，簡單說來：在個人是自私，缺乏公忠體國的純潔精神。在政府是懦弱，缺乏固定方針，貫徹能力。在老百姓是：貧、愚、和懶；缺乏正確意志，為正義而奮鬥的優風。需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政府本

身是空的，老百姓的意志是實的，政府全體機構，能夠執行人民的意志，(Public will)即是沒有脫節，這個政治才是活的，有用的，反之，公家都關門做官，人民私慾橫流，天下不亂，未之有也。

(上接第七頁)

現實，在社會上是缺乏自動的協助力量的。

一種方案雖應該有一種中心思想，但這種思想必須是完整的、客觀的與遠見的。革命是斬舊更新的大心理行動，但其是否成功，尚不在其能「斬舊」，而在其真能「更新」，所以一般都承認破壞易，建設難，就是這種道理。斬舊可以憑心理旺盛；但是要建設就不能不「磨頂踵足」的與現實相接觸，因為社會是很複雜的，人究竟不能完全除去過去的傳統，所以如何去處理，就不是很簡單的事。

最好的改革幣制只能比做一把火，用以燒斷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但其本身並不能保證以後新幣制會成功，故必須有種種基本工作，而這種種基本工作又決不是一紙命令就可以開始的。例如行政效率不好，改制後也不見得就會好，必須是給官吏們足以養廉和振作的待遇，方可期望重建吏治。又如預算收支不平衡，因素甚多，並不是因為為改制，用估計方式以新幣計列後就可以平衡的，這都設法做難。

社會本是一個互相謀利的社會，硬叫大家改此觀念，也不容易，一二人可以，而不能求之於大眾，所以必須事先預謀種種限制與出路，一方面管制，一方面誘導。而不可因為少數人投機的可恨，過份使用政治力量，弄得人心不知所終，窒息了工商業。有人說，這都可以用社會革命方式糾正之，但要注意一點，就是所謂社會革命必須是具體的，不能是部分的或片面的。以中國這樣大的一個落後農業國家，要實行社會革命，重心首先恐怕還在鄉村，因為城市一點工商業，固營的已佔半數，民力力量有限，就是全部社會化了，也不能解決當前中國經濟上的艱困，因為中國財富的根本，還是在靠天吃飯的農村。百分八十人民的國民所得不能改善，無論

你用甚麼新方法，都不容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並解決政府的財政。在對土地問題沒有辦法以前，先打出社會革命的口號來，是相當空泛的，因為我們還未發展到那種高度工業化的地步。

最後，必勝的心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固執，要知道經濟上是有着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所以我們也不必堅持着一種固定不變的政策。社會科學上無所謂絕對好的原理原則，要視其能適合此時此地！

(上接第十三頁)

財務行政便利的慘痛的經驗；再不要仰賴發鈔來籌措政府的財源。其次，我們就社會上的分配情形來看，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不平！在八年抗戰之後，又經過了三年的戡亂戰爭；在這十多年的戰爭期中，由於政府那種錯誤的財政政策，使得整個的戰費負擔都落在中下層人民的肩上。上層階級的豪門巨賈，却反因抗戰與戡亂而更發了大財。真正負擔戰費的中下階層的人民，不僅沒有了他們過去辛苦的儲蓄和資產，而且更降低了他們應有的生活水準，荒廢了他們那些優秀子女的學業。在另一方面，那些發大財的豪門巨賈之流，不僅得不到任何戰費的負擔，却反而形成了他們那種危害國民經濟的能力！在這一升一沉的慘劇中，激起了人民的怨憤，於是乎「亂」便四起了。所以今後應將「亂」戡平，則當趕快放棄以發鈔或具有膨脹通貨性質的發債為籌措財源的方法，從速開辦財產稅，澈底推行所得稅和過分利得稅，藉以打擊破壞整個國民經濟的豪門，減輕中下層人民的負擔。再其次，就目前的生產事業情況來說，大都經過了八年抗戰的摧殘，遭過了三年戡亂戰爭的阻礙，受盡了不合理的捐稅的阻抑，吃夠了通貨膨脹的苦頭，如今已是弄得氣息奄奄，那裏還談得上發展與擴充。我們的生產既不能發展，稅源當無從增加；這是極簡單的道理。可是十多年來的財政當局，不從課稅與養稅兩方面想辦法，還談什麼「復興經濟」？還談什麼「建設國家」？所以我們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來說，負責籌措財源的財政當局，亟應停止發鈔的辦法，切實整頓稅制，重課既得利益的豪門巨賈；再視客觀上的需要，補以恰當的公債政策。必如此，始足平衡預算，穩定經濟；必如此，始足以平均財富，安定人心。人心既安，則「亂」不待「戡」也就自戡於平了；經濟既穩，則「國」不待「建」而自建於強了。

# 三論我國經濟問題中的心理因素

楊桂和

## 一、以幣制改革為中心

筆者對於這題目，已經寫了兩篇文章，都是指出我國經濟問題弄得很亂，是有一部原因應該歸咎於心理的不正常。我所指的心理不正常，不僅限於當局、執行者、社會上有力階層、一般人民，而且包括輿論界。第一篇是泛論各階層的心理因素，第二篇是就主要問題來分析的。本來已可敷衍繳卷，但自改革幣制以後，又有了許多新事象，足以補充我上兩篇的欠缺，所以願以改革幣制一事為主，分析其間的心理成份。以就致於發達。

## 二、百分之百之心理因素

假定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這次幣制的改革，真可稱得是百分之百的心理作用的結果。誠然，在事前當局也有種種準備工作，但是也都限于紙面文章而已，實際而具體的工作，還差得很多，自然不足以言改革幣制。但是，當局就毅然改幣了，這是甚麼緣故呢？據我們的觀察，這是心理成份很重的一次舉措。

我如是論斷，也許是過份的，但事實上發達，又證明我這種判斷並不十分荒唐，何以呢？有事為證：

- (1) 平衡預算的工作，沒有舉辦，印刷機財政照常進行。
- (2) 整頓稅收，也看不見動靜，財部仍在調整貨物稅率。
- (3) 沒有新的借款成功。
- (4) 匆匆收兌金鈔，未顧及廣州及西南一帶金鈔價格之低，會引起物價上揚。
- (5) 宣布使用硬輔幣，釀成西南一帶之輔幣風潮，

物價大漲，而沿海則不見輔幣，原來當局手中輔幣並不多。

(6) 限住八一九物價，但第二步辦法則遲至今日還未宣布，弄得市場形成畸形的冷落。

即此數點，已可說明當局的改制，在事前的準備工作，相當缺乏縝密的考慮。而多半是憑了一種百分之百的心理因素。蔣總統在招待京滬民衆機關及銀錢業代表茶會席上即稱：「凡事之成敗，繫於吾人之心理者亦甚大，如全國上下均能以健全之心理，確信此次經濟改革必能成功，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改制的大標題是：「祇許成功，不許失敗！」

## 三、對改革的兩種看法

在改制以前，大體分來是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的。一派比較穩妥的經濟學家，都主張當局應先作改制的準備工作，即穩定法幣的工作，而不要輕於嘗試改制這件「法寶」。筆者在第二篇文中也指出，改制並不是「仙丹」，我說：「太信任改制為『仙丹』，而不知道那是一劑『苦藥』，將來會感覺得意外苦悶的，結果很容易把改制的本身，弄得四不像，效果全無，徒增紛擾！」

但是也有不少主張改革幣制的，這裏面有專家學者，也更有主政當局等等。其主要理由，大致是說如果不改制，則一切事如平衡預算整頓稅收之類，都無從着手，而且無法控制預算。當物價在瘋狂上漲之時，只有加以鎮靜劑，然後方能「開方吃藥」。

話也不能說沒有理由，不過也就因此把一切寄託在改制上面去，以為非改制則一切不必幹，幹也沒用。可是，這種心理的成長，就是改制的一大毒藥！

歷史上雖然分爲中古與現代，但是真的有一天是古與現代的劃界線嗎？還在經濟上也是如此，無論如何偉大的改革幣制，也都不是可以「一刀兩斷」的，革命也是如此，經濟改革尤不易有那種「一改萬事足」的境界。

既然不易「一刀兩斷」，請問改制前不能整頓稅收，則改制後就可以保證整頓嗎？難道說，改制後工商業會正常發展？稅務人員會振作一新？地方惡勢力會忽然消滅了？商人會忽然拋棄了盈利觀念？惡劣的稅吏會忽然的「懺悔」前非，而竟放下「屠刀」？這些都是大成問題的。越是你覺得非改制不能辦，就越證明改制過後也未必能辦，這辦不辦有其根本原因，不在改制與否！我國官場裏是有「推」這一項工夫的，把整頓寄託在改制上，也是「推」工之一種，這當然不是正當心理。

## 四、建立幣信的矛盾

自然我承認當局是有意重建幣信，換言之，即想恢復人民對貨幣的信仰，這當然是很對的，例如成立發行準備監督委員會，每月發表檢查發行數字，以示政府之自我約束，以喚起社會對金元的信心。這點我覺得很對。

可是，不幸在本月五日上海金融管理局即通知票據交換所，即日起停止發表國家行局每天的差進差出數字，以此乃有刺激市場作用，這點又使我對於當局的發表發行數字檢查一事，有些不解了。

最刺激人心的當然是發行的公告，要禁止應該先禁。至於每天的差進差出，由於現鈔的收付以及轉帳等等技術上的關係，本來並不正確的，它之不足以表示真正

市場資金的懸緊，凡是略有金融經驗者，類能道之，筆者這裏不想多說。新聞界由於資料的貧乏，所以每天也把它登出來，作為一種參考則可，若說真正市場上是受這數字控制，那未免是看太重了它，特別是今年七八月以來，這項數字根本意義不大，就連撥機家也不利用了。可是，不知道如何倒把它禁止刊布，不免有小題大作之嫌，而且有壞影響。

第一，無異明白告訴社會，政府赤字又在大增了，更能增加人們的懸揣，這不是和以前法幣不公布的惡果一樣了麼？

第二，使人懷疑今後金元發行數字的真偽，因為每天差出差進都不肯公開，如何可以公開一個月的總赤字？

所以主要問題還在當局有無平衡預算的決心？如有而且真是自我約束，則應有赤字，雖然公告，也會得到體諒的，為害不大；否則，這樣做，不是給發行委員會的信用打了折扣，就是增加無形無影的造謠機會。難道當局還未領略過去禁止發表發行數字的不應有的謠言影響麼？

我覺得：一國不怕有赤字，只要真是在適當的地方，支用的方法按序合理，並不一定生惡影響；反之，表面一點赤字沒有，愈使人覺得政府是在偷竊摸摸的擴大支出！

### 五、收兌金鈔減少入口

從當局宣布收兌金鈔和減少入口兩件事看來，使我們不大瞭解這其中的目的何在？從簡單的表面看過去，似乎也有些疑問。

(1)當局說收兌金鈔是為鞏固新幣的基礎，但是金元是不兌現的，其基礎如何維持，當然要靠它的購買力穩定，如何穩定？一方面是少發行，一方面是增加物品的供應，為達到少發行就不應急於收兌，就是收兌也

不應立刻放出大量金元的！

(2)在現狀下，進口貨的供應對市場影響最大，剛勝利的情形就可證明。當局減少進口就無要減少物資供應，這是不利金元券的！

(3)要說收兌是為消滅黑市，也不必立刻付出金元，儘可先辦登記，分期付款等等，人民之兌換踴躍，主要還是怕犯法，而不一定要現金。

(4)要說減少進口是為了有美援物資進口，那麼我覺得與其宣布減少限額，還不如徹底修改現行的進口制度，表示一點大方的態度，增加人民信賴。雖然我們不可能無限制供給外匯，但至少應該使登記金鈔外匯者有較為自由輸入貨物的便利，這樣，政府雖然拿不到全部金鈔，但因為人民運貨進口，無異是替金元撐場面，我認為那是比較「兩全」而危險性較少的，至少不至於像目下游資泛濫的可怕。

所以，我覺得這恐怕是當局的「望治」心理太切，或是主持人多多少少有些「邀功」的私念，否則，不應該把兩件事同時宣布的，難說政府真是在實行「一石三鳥」的政策嗎？

### 六、放出通貨、銀行增資

另外還是一點似乎不為正統經濟所首肯的就是銀行增資一件事。改制以後，銀行資本太小自然需要增資，這對銀行本身以及存款人都有必要。

但是，使人最不解的就是增資以後的現金部份要存在中央銀行三個月。這是甚麼目的呢？可能這樣解釋：(1)怕銀行不真正增資，而借用資金，在驗資以後，即完全一如前狀。(2)收縮通貨(3)控制銀行放款力量。

據我們粗淺的認識，為保障存款人的安全，主要是在銀行資產構成的健全，懂得分散風險，資產易於變現，但還只能應付平時的風波，像今日我國的不正常情形下，如果發生風波，恐非銀行本身所能應付得了的，這

也就是存款準備金以及存款保險等辦法提倡的主因。政府如果是為存款人着想，應當分別檢查個別銀行的資產負債情形，然後才能斷定其經營是否健全，光是靠增加資本是絕對不夠的。

說銀行不願自己拿出資本來，這種說法也似是而非，因為根本上所謂「資本」，是很難弄清的名詞，一個銀行的資本，也不會空放在庫裏，而必須經營放款投資，批評目下銀行資本太小的人，恐怕並未弄清楚「資本」的意義。對於一個新成的銀行可以規定其資本，但是對於一個已經成立而經營業務的銀行，硬要它拿出一筆資本來，就有點近於苛求，何以呢？請以一例說明之：甲銀行戰前資本一千萬元，經過抗戰並未變更，每年為保存實力應付危機起見，分紅也採緊縮政策，行政費用也極節省，故能累積若干資產及外匯。存款由於通貨膨脹關係，大大的減少，所以銀行的負債比起資產來，是小的可憐，但該行因為幣值不定，資產價值仍維持原價，所以看起來資本很小，但這只是帳面的，假定要使其符合實際價值，只要經過重新估價的手續即可，因為它的實力已經很厚，絕對用不到再叫股東拿出現款來，實際上股東多年的投資利益已經很小，銀行經營得又非常穩健，何以又叫股東出錢呢？因為只有在願意擴充銀行業務或是銀行負債太多的情況下，才能叫股東增資的，但目下銀行既不擴大，又無虧累，如何還要錢？

因此，從銀行對股東的立場上講，這種普遍式的增資，是有些交代不下去的情形。因為股東並未去抽去資本，銀行經理也未存蝕公款，資產且大於負債，自然不需要再增其資產，更談不上要借用資金，因為根本上銀行的資本是已經存在的現實。

說為收縮通貨，其作用也不很大，據有人估計，最多全國銀行現金凍結也不過一億金元，這對通貨有何補助？看發行的公告，不到兩個月，金元券已經到了十億元左右了嗎？而且還有申請動用的辦法。因為只能凍結



一億餘金元，故其爲控制銀行的放款力量，實際上也不會多大。而且，銀行的放款已經有了種種限制，似乎也不需要再另起爐灶的。

分析之餘，以及看錢界與當局折衝的報道，好像還更着意收縮通貨一點，因爲當局斤斤於半數繳現。假定此種觀察不誤，則我們又覺得當局誤用了心機，以爲如此可以鎮壓市場。殊不知市場之不穩，遠在金融業能力範圍以外。政府太看重了金融業，所以有時候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以爲砍倒幾棵樹就「天下太平」了，豈知滔滔天下者又何常不是樹呢！

我不是說政府不要管金融業，當局若干對金融業的措施也有其規範作用，比完全放任是值得稱贊的，但是這次普通通貨問題，我覺得多少是歪曲了一點，或者就是因爲當局在心理上是對金融業的錯覺。

### 七、限價、低利與增產

按照緊急命令的規定，有三點是相互磨擦的：(一)限價於八一九的水準，不准變更；(二)銀行放款利率應低至戰前水準，不准提升；(三)希望生產增加。表面看過去，也不能說不對，但是忽略了十年經濟的現實，而期以心理戰勝環境的。

我不說這種想法不對，在一個新建的國土上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移植到這已經受了十年通貨苦痛的社會裏來，就不免過份「心急」一點。

八一九價格與成本的水準本身是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形，因爲八一九前的生產已經在萎縮之中，真正能從事生產者能有幾人？國營事業是靠信用膨脹來維持的，民營事業又多半是靠波瀾式的漲風來勉強維持的。生產部門的根本問題至需解決，最根本上是成本與價格的合理機構。

新方案限價是爲了打「鎮靜劑」，當然可以，但是何必急於降低利率呢？也許當局以爲利率高足以增漲物

價，這種想法當然有道理，但不知道利率因素的影響是間接的，是被動的，決不是物價增高的主因。這裏不想多說。

利率不僅不是刺激物價的因素，反之，高利率在某種程度下且有壓低物價的力量，這在過去是常有表現的。最好的說明，是每當大家都不願意放拆息的時候，物價必大爲波動。

多數改革幣制的國家，至少在初期，一定是利率很高的，以促使物價下落，至少是無力上揚。我國這次並未壓低物價，而且因爲收兌金鈔以及封鎖經濟辦法的實施，弄得銀根懸盪不堪，利率空前下落，大有恢復戰前水準的傾向。

這在當局看來，也許認爲是成功的。因爲利率低了，生產事業成本可以減輕，則物價不致增高，借錢容易，生產事業應該發達，則增產目標可以達成。

不過，當局似乎忽略了兩點：(一)利率太低，不足以鼓勵存款儲蓄，(二)光是低利並不能增加生產。第一點的意結果，就是增加人民消費，對於錢看輕，因爲錢不能生利。當局大量收兌金鈔以後，而不給一個出路，自然會發生搶購風潮。

在中國這種社會裏，生產事業的擴張，國營者除外，民營者還是靠：(1)發展企業的近景、(2)投資之有利及安全性、(3)原料及成品之來源與銷場。拋開第一點有關大局不談，第二三點在新方案後，都多少受到了打擊。這打擊可以說是受「打虎」的影響。「打虎」誠不可厚非，但祇能是臨時措施，而不能構成政策。在私有財產制度下，工商業的盈利是合法的，至於搜機與過份利得，政府應該有對付的方法，在先進國家奉半羸其好的稅制。工商業根本不容易得到暴利。所以暴利之產生，如果論不是，政府法度之欠缺，也要負一部分責任，不是政府在事實上寬縱了工商界，就是執行官更的無能，否則難道說中國工商家是特別的好利？無良心？

不說這話，投機暴利存在是事實，所以引起了「打虎」工作，很不幸的是一般把這種措施過份的宣揚了，就形成了工商界人人自危的現狀。古時所謂「無商不好」的看法，大有再度抬頭之勢。我不說這種看法的是非，但是，我要指出的在現經濟結構下，假定有這種風行一時的觀念，很有打擊一般工商家向上努力的信心興趣。

無論我們贊成資本主義或否，但企業家的創造因素一點，是現代生產擴展的原因，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常在幼年，經過千辛萬苦，建立一點經不起風吹雨打的工廠和機構。滿以爲勝利以後，國家太平，可以大展宏圖了。不幸又逢經濟上的艱困局面，因貧困而生的「恨富」觀念逐漸流行，這也原不足怪，最使這般工商家沮喪的是所謂「打虎」運動。因爲凡是繼續擴充長大的事業家，都可以被視爲「虎」的。

誠然，企業家不能無「利潤」的觀念，但是正如經濟學大儒馬夏爾所稱：現代企業的特徵，並不是專門的競爭，而是富有自信、獨立、自我選擇以及深思遠見的。(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5.)換言之，即現代企業家都多少有他的社會觀與理想，而多少不願受人干涉的。在中國因爲政治社會關係，這種境界求來已不完全，而這次的行動，顯然更打破了將後的憧憬。

現代中國企業的功過，我們拋開不談，但是如果政府不預備徹底改革經濟制度，這樣的措施自然無異給生產界潑了當頭冷水，低利如何會發生作用？低利假定不能刺激生產，其結果只有更助長投機！

### 八、心理與環境

私見以爲，改制過份信仰了「心理戰勝」一點，事前事後的準備工作較差，又因爲過份着重理想，所以若干措施不免與事實不能適合。這在設計者多少是忽略了

(下接第四頁)

# 亞洲安全與對日和約

彭文凱

最近中國外交上，有一個重大的轉變，就是外交政策由被動而改為主動，由從附而趨於獨立，這從王外長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及前行政院長張羣氏訪日歸來的談話和廣播中，就可完全看出。王外長公開提出請求亞洲遠東國家須有一個強固而友善的同盟組織，張羣氏強調須早日締結對日和約，今後世界的建設，將以亞洲為中心，中國應及時建立積極有為的政策，以求全面繁榮亞洲，集體保障亞洲民族之生存與安全。和早日促成對日和約兩點。這兩點雖不敵說是中國政府既定的國策，但以兩民過去及現在在中國所處的地位和所負的責任而言，至少可說指示出中國外交政策有一種新的動向，那是毫無疑問的。

就目前國際形勢來看，上述兩點，誠然是為亞洲民族所發出的必要的號角，不容忽視。因為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不備世界和平，迄未到來，且由於美蘇關係的惡化與冷戰，歐洲早已形成兩大強權的對立。目前的形勢，美國決不會受蘇聯感化，使整個世界變為共產主義的帝國，蘇聯也決不會放棄共產主義，採用資本主義，與西方國家合作，因此使人想像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必將到臨，除非目前雙方造成均勢，或尚不失為避免戰爭，暫維和平的途徑。目前歐洲相對的均勢局面，大致已經形成，一方面由於蘇聯以斯拉夫民族及共產主義的號召，東歐早已成為蘇聯強固的壁壘，他方面由於馬歇爾計劃的實施，西歐諸國的團結，亦已築成了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長城。所以，歐洲局勢甚至如柏林問題，雖仍異常緊張，但由於雙方均力敵，實際上尚不致於爆發戰爭，歐洲問題並不是國際風雲的重點。

反觀歐洲方面，雖然第二次大戰曾帶給亞洲民族一

條新生之路，中國獲得了光榮的勝利，各民族紛紛起來獲得了獨立解放，正象徵一個亞洲世紀之來臨，也似乎是世界和平之有力支柱，但是光明反映出黑暗，使命帶來了艱難。目前亞洲問題正陷於更複雜和嚴重的階段，如美國之單獨扶植日本，中國之長期內戰不止，朝鮮的南北分裂，東南亞各地的一片烽火，緬甸、越南、暹羅、馬來亞、荷印、均鬧着內外糾紛，可以說整個亞洲大陸，正瀕着熊熊的戰火，而亞洲大多數國家，正渴望着經濟繁榮，求免於貧窮與飢餓的光降。所以，亞洲問題，實為世界問題的重心，沒有亞洲的和平，就不會有世和平，沒有亞洲的繁榮，也不會有歐美獨享的繁榮，亦可說亞洲之安定與否，將必為決定世界命運的契機。

亞洲在自然的條件上，如面積、人口、資源、以及陸地和海洋各方面，均遠勝於歐洲，本應在世界舞台上佔着優越的地位，表現出偉大的貢獻，但由於亞洲各國，一向缺乏認識與覺悟，沒有真正的團結與組織，而歐美列強過去因為牽涉到其廣大的殖民地問題，以及始終持着「先歐後亞」的政策，對於亞洲問題，不是積極干涉，便是消極漠視，以致常給予野心國家及極權主義以可乘之機，而造成目前亞洲的混亂局勢，這對於亞洲的地位，以及世界的和平安全，可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所以，今後如何面對現實，及分析現實，自我努力，共同奮鬥，應該是今日亞洲民族的課題。唯有亞洲民族自立自助，互利互惠，共同集體措施，始足以言建設亞洲，消除危機，才是自覺抉擇之路，進入和平繁榮之境。中國為東亞文明古國，也具備了一切優厚的條件，應該在外交上積極有為，一馬當先，尤屬責無旁貸。

今日亞洲民族一致的請求，既為安全與繁榮，欲達

成共同的安全與繁榮，無疑的必須由亞洲民族首先結除心理上的隔閡，共同聯合行動，才能保證成功，而且國家與國家的關係，純基於現實的觀念，決無永久的恩怨可言。因此，我們為達成亞洲集體安全之真正實現，不能說不要日本參加，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日本侵略了中國幾十年，也是破壞和平的禍首，現在由於和約尚未締結，在法理上他與盟國還存在着戰爭關係，還是我們的敵國。所以，我們不贊成在未締結和約之前，就與他來談集體安全問題，或談什麼「共同合作」？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早日促成締結一個對日和約，清算日本問題，澄清遠東的局面，使中國及其他盟國與日本恢復正常關係後，才能談得到亞洲集體安全問題。也唯有利用一個真正而合理的對日和約，產生一個和平民主的日本，才能真正使牠為亞洲集體安全而努力。否則，如過去日本侵略的所謂「中日親善」、「中日經濟提携」、「共同防共」、「建立東亞新秩序」，實際上不過是侵略和掠奪他國的護符。這樣，真正的亞洲集體安全，永無實現之日，所以，此時中國採取主動早日促成對日和約，實是一個刻不容緩的時機。不過，談到促成締結對日和約，我們就須注意到和約簽訂後對日管制的問題，也就是說為了增進亞洲集體安全，我們如何利用和約中的條款以及和約簽訂後的管制來實現這目標？我們認為最緊要目的，是使日本不致恢復其在遠東的擴張政策，要達到這個目的，當使日本人民不願作戰，也不能作戰，這才是理想的保證方式。因此，我們將來在和會中，必須堅持達成下列兩個重點：

第一、我們要日本人民不願作戰，就必須使日本實質的民主化，也就是說要使日本促成一種政府，保證日

本人始終能享受政治的自由，足以防止有野心好戰者集中權力。所以，我們認為除和約中應該規定，凡是日本新憲法或其他基本法律所制定，關於給予人民的政權和人民權利，將來不得廢止或侵犯外，至於政治和教育及社會和經濟的改革，長就必須利用日本人自己推行。但盟國必須使日本的進步分子和改革家有權力而自動的組織及教育民衆。此外并須以勸勵和勸導方式，外交上的壓力和經濟上的誘導之以及其他非強迫而有效手段，去促成日本人民潛移默化，這樣才能使日本真正自行的民主化，根絕好戰和擴張的思想。

第二、我們要使日本人民不能作戰，就必須使日本解除軍備，也即是須要使日本沒有再度侵略的工具。關於這一點，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困難，因為此次大戰後的日本，武裝既已完全解除，工業已受嚴重損失，也許賠償使牠更難減少，其在外國的產業和投資，以及在亞洲大陸太平洋的商業市場和戰略據點，亦均已喪失。然則日本在長時期內很不容易恢復牠的資源和工業，到達一個適當的水準，換言之，目前日本的情形，牠的工業力量，決不能超過一九三一年的水準，牠的經濟也沒有

一個因素，足以使其達到一九四一年的水準，所以，要使日本沒有從事作戰的能力，只要日本的領土限於本土四島，而不輸入作戰物資，牠就無力是作戰的，也即是說，只有外國的援助，日本危險的擴張政策，才會復活。但盟國是否履行責任，繼續阻止或限制這些物資的輸入，純粹是一個政治問題，尤其要看將來美蘇的關係如何演變而定。并且事實上現在美國的對日政策，已在積極扶植日本，固然，我們同意爲鼓勵日本民主制度與一個和平的遠景，及減少盟國救濟的負擔，必須使日本的經濟提高到足以維持其生活的水平，但我們也必須想像，如果日本獲得外來的經濟援助，牠可能獲得對周圍地區經濟控制，這雖非視同軍力，但也是走向軍力發展的一步，亦未可忽視。并且如果照美國所謂「亞洲工

場」的政策推行到極端，日本決不能永遠固定於一定生活與貿易的水平，遲早必會發展一種力能擴張的經濟，甚至要發展到軍需作業，那末其他盟國勢必感到商業利益受歧視，和平安全受威脅。所以，兩年來因美國單獨進行管制日本，未能顧及太平洋其他各國的利益，早已引起中國工商教育界發生疑慮，菲律賓與澳洲表示反對，甚至英帝國集團也很焦慮，如果日本工業復蘇，則英國西南太平洋的市場受日貨打擊，英鎊集團將受嚴重損失，然則盟國將來在和會上，一面要適當的接濟日本的需要，一面又要避免上述的禍害，如何獲得妥協，就很困難。不過我們認爲如果將來一定要給予日本這樣的接濟，至少和約的締造者，必須負起責任，注意接濟的質和量，是否將使日本足以備戰或作侵略準備。

總之，亞洲安全與對日和約，實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的，我們要增進亞洲集體的安分與繁榮，就首先要促成締結一個真正而公道的對日和約，使日本真正走上和平民主之途，能與太平洋各國和諧相處。至中國對日政策原以保障國家安全與保護遠東和平爲主旨，中國對日本人民始終採取寬大態度，願見其締造民主，維持生活，成爲一個完整的國家，只要中國這一政策能夠貫徹於對日和約之中，凡足以促成對日和會與和約及亞洲集體的安分者，中國政府必將樂於從事，我們切望當局朝看上述目標，應即採取主動，早日促成對日和約之締結，以澄清遠東之局勢，藉以奠定亞洲集體的安分之基礎。

(上接第十四頁)

在四九二九次懷孕中，有四四八次爲流產，一一一一次產下已死。四三三〇次雖屬產出，可是有二一四六個嬰兒產下後不久即死去，死亡率竟爲四九五比一〇〇〇(即一千個嬰兒中有四七五個嬰兒死亡)實在太可怕了。

南方成年人的死亡率也很高。我們研究上海亞洲人壽保險公司的生命年齡表即可知一種概，表內的數字是

該公司多年精密調查的結果：

中國南方人與北方人生命年齡之比較

年齡	人數	死亡數	平均死亡率%	北方華人死亡率	南方華人死亡率
20	1 000	10	1.0	0.7	1.2
25	1 000	12	1.2	0.9	1.5
30	1 000	14	1.4	1.1	1.7
35	1 000	17	1.7	1.4	2.0
40	1 000	22	2.2	1.8	2.5
45	1 000	28	2.8	2.2	3.4
50	1 000	35	3.5	2.8	4.2
55	1 000	45	4.5	3.5	5.5
60	1 000	60	6.0	4.5	7.5

北方人的壽命較長

根據上表所示，可知北方人的壽命平均較南方人爲長，每一千個四十歲的人中，北方人死亡數爲十八，南方人死亡數爲二十五個，五十歲的一千人中北方人死二十八個，南方人死四十二個。六十歲的死亡比例爲四十五比七十五。這是毫無疑問的受着氣候的影響。

近來有許多從北方遷移到南方來居住，從上列引述各點來看，實在是將中國人種引入自殺之途，南方的高溫與濕氣，漫延的寄生蟲細菌以及養料缺乏的食物，將使我們中國人種趨於毀滅！

今日全世界的各民族，需要一優良的體格與生物條件來担當複雜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問題，如果中國要保持爲四強之一的國家，實應立即阻止人民向亞熱帶遷徙。(譯自十月九日密勒氏評論報)

# 經濟管制問題

李鵬天

## (一)

經濟政策的演變是有其時代性的。從自由經濟發展到管制經濟，主要是在一般工業國家，由於放任的經濟政策不能避免經濟恐慌的厄運；凱恩斯主義所以盛行一時，即在於提倡政府的主動干涉政策，而獲得了確實的成就。其次，戰爭經濟也是促成管制經濟的。政府要實行全面戰爭，要從有限的資源中取得必需的供應，不得不控制住整個的生產和消費，讓一切為了戰爭。今日而論管制，首先不能忽視一國經濟發展的階段。近時實施經濟管制比較成功的國家，其社會背景如何，實較之制度本身尤為重要。以英國為例，英國無論在工業發展或社會組織上，都可以稱為先進國家之一，今年七月開始實施的社會安全計劃，更有人類經濟思想一大革命之譽。英國的配給制度遍及食、衣、行三項，食糧配給包括主食品如肉類、黃油、茶葉、糖等，輔食品如水菓、罐頭等，配給證分為三種，即六歲以上，六歲以下和旅客，各種登記非常詳密，事實上全國人民均領有配給證，無證根本就無法生活。這種繁瑣的辦法在我們習慣中很難想像，但恰恰相反，他們辦得非常成功；黑市不能說沒有，然而毫不重要。

嚴密的經濟管制，有些基本條件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要有健全的社會組織，這包括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和高度的社會文化道德水準。管制是入為的，執行機構的健全和廉潔與否，可以決定法令的良窳，而人民的守法精神以至對抗貪污的精神，則是社會組織的基礎，可以和政府機關相輔而相成。第二，要有技術的基礎，其中最主要的是統計數字，其次才是根據數字而擬訂的計

劃。從生產到消費都是一些確確實實的商品和勞務，空洞的文章不能規定經濟結構運行的步驟，管制不能無所依據。

從上面兩點而論，我們可以看出幾點：第一，管制工業便於農業。工業是機器生產，從原料變成產品易於計算，農業受自然影響較大，生產不大集中，較難控制。第二，管制都市便於鄉村。都市人口集中，戶籍登記比較容易，而且交通發達，通訊便利，無論發佈命令或檢查庫倉、分配物資都很簡便；鄉村則完全相反。第三，管制生產便於分配。前者是定住的，容易控制，後者在流動狀態中，設法逃避的可能性較大。

至於經濟管制的效果如何，在現階段之下，自然較之放任政策為佳。不過，有時候管制容易發生種種流弊；此以流於消極為主。消極的管制也不是要不得的，但易於引起窒息作用；於是因窒息而加強黑市活動，最後則形成適得其反。經濟活動總是走向均衡的，這和水面的走向水平一樣，儘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而物價總歸要和供需關係取均衡，資金總歸要向高利處投資，任何管制如果違反了這種法則，恐怕就不如放任了。放任可使經濟活動照經濟法則進行，雖然有時不免浪費，但沒有人為的摩擦加在裏面，而這摩擦是有成本的（如管制機構的經費、經營黑市的成本等），必須由社會負擔過去；如果摩擦增加使得生產停頓，其為害更屬顯然。

## (二)

管制改革後所實行的種種加強管制辦法，我們在原則上，自然毫無異議。原來在改幣以前，法幣的惡性膨

脹已到崩潰前夕，養成了普遍的看漲心理，如果不把愈買愈漲、愈漲愈買的循環截斷，這種新的紙本位當然會瞬告失敗。但是，在目前却又遭遇到新的難題，一方面是資金泛濫，一方面是搶購物資，似乎又有點不穩了。

任何管制辦法，其本身就具有一種累積推進的作用。管制是入為的，社會組織不和機械一樣，多少總有漏洞，設計的對策也不能完全準確無誤，所以任何一樁新辦法出來，日後必會發生罅隙，於是又得需要另一新辦法去阻塞它。這樣，愈管愈要管，愈管愈嚴，即令不滲雜意氣（以及政治意識），也是很容易走到消極和極端去的。我們很怕這種沒有限度的發展。

對上海，我們一樣的加以嫉視。從上海變成租界起，國內外不同的惡勢力養成了上海社會的剝削性，這裏有很多的既得利益階層，更有無數的寄生階層，他們完全不事生產的勞動，股票、金鈔、紗布、貼票等等，樣樣都做，但根本是投機性質，別無作用。他們最怕物價不漲，有黑市才有生意做，沒有黑市也得「做」出黑市來賺點錢，小則糊口，大則發財，這幾乎成了風氣。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這般寄生階層還是社會培養出來的，無非「傳統」；比方說，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正當職業，所以祇好做黃牛了。進一步說，上海擁有全國最多的輕工業，政府稅收在上海的要佔一半以上，我們光是嫉視上海，是不合適的；比方說，打倒既得利益階層可以重課捐稅（指直接稅和財產稅），但工商貿易總得維持。這是一個原則。

把問題擴大來講，管制上海必須管制全國。糧政當局最近向立法院報告，指出若干區域限制糧食自由流通的事實。經濟的區域化，主要的原因在於物資的匱乏，

本是根本問題，但如其不能有無相通，則不但上海將來有無飯可吃之虞，而尤其重要的是窒息了經濟活動。商業行為有時被視為剝削性的，但貨暢其流永遠是天經地義的原則；農村的糧食和原料不能到都市來，都市的製造品就不能到農村中去，求善價而沽如果不含投機意識，本是正常的行為，即商品找尋最大的效用；否則大家根本不生產品，或生產而窖藏，最後就成了工廠沒有原料，農人也不添衣物，整個經濟走進僵局。

如果經濟管制能夠徹底，這種有無相通可以把它一部份由政府來辦，另一部份用法令來控制（如限價、不許囤積等），但不幸我們對於前述的兩個基本條件相當缺乏。中國原本是一個農業階段的經濟社會，地區遼闊，超勢散漫，教育不發達，有些辦法根本不能行諸農村。據說杭州鄉間買豬，行的物物交換，三斤黃豆或三斤鹽換五斤豬，黃豆或鹽漲價，豬肉就不得不漲，鄉間沒有經濟警察，即辦經濟警察也無法控制住零星的交易。這是問題的焦點。上海不同一點，這裏有良好的警察制度，生產在工廠裏，到貨在碼頭上，存貨在倉庫中，交易可以找公會和批發市場，不法交易可以利用現代化的偵察制度來處置，嚴格的辦，黑市應該不會發生。但上海不能孤立，原料和糧食必需源源接濟，原料可以仰給外來，糧食却與農村有密切的關係，幣制改革以來，上海的菜市最難就範，其主因何在，至為顯然。

前面已經談過，經濟政策的發展有時代性，西方國家採行的制度與其經濟背景有關。它們是工業國家，經濟管制所以能夠逐漸由疏而密；我們的情形既不一樣，於是辦起來固然比較吃力，收效的可能性也就較小。

我們主張現行的經濟管制要有一個限度，但這個限度如何，自非此間所能盡，因為我們缺少詳細的研究和資料。消極的說，硬性限價和全面配給，在必要時總需加以考慮，照目前各地的情况来看，有許多事體辦不通，有許多事體辦通了也可能得不償失。舉例來說，上海

黃牛猖獗，外埠物價波動很大，重慶暗息在三角以上，港匯聽說也在報縮之中，新幣的膨脹形勢已成，恐非少數地區的力量所可糾正。其次，全面配給的技術上的困難固屬不少，而政府在配給中所需增加的發行，以及配給物資如何取得，在在也是問題，我們很怕辦到青黃不接的時候而一旦停辦，其結局恐怕更是不堪設想的。

(三)

從整個局勢觀察，我們以為有許多事情誠非管制當局所能為力。幣制改革以前，發行總數不到法幣六百萬元，九月底的發行額是金圓券九億五千餘萬元，折合法幣近三千萬億，四十天之間增加了五倍之多，游資泛濫自有其正常的因素。幣制改革在收兌金鈔上多少是失敗的。八一九西南一帶的黃金黑市都在四億元左右，八一九以後突然提高到六億元，這當然提高了購買力。人民把金鈔給政府，換得了金圓券，却無他們認為妥當的投資場合，於是一日風吹草動，就不免退求自保，而發生狂熱的搶購風潮。假定物資充沛，那究竟把這些剩餘購買力全部吸收，鋪子里再有貨色，人民也無錢可買，要漲價也漲不起來。所以物價誠然是商品和貨幣對立的均衡關係，在本上有自然的調節作用，管制如非徹底有效，實難防禦這種衝擊。我們反對黑市，但無法否認搶購的現實性。這裏可以預言，如果十月份發行數字還是以高增加的話，恐怕還會有新的問題。

據發行檢查報告，九月份發行中，有二千二百萬元是政府用途，這個數字超過了八一九的發行總額。政府浩大的財政赤字，實在是經濟動盪的最基本的因素，這也不在經濟管制問題之內。固然，任何國家改革幣制，其稅收實值的增加總非一蹴可幾，但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正是短期間的，如果物價能在短期間「自然的」平衡，幣信隨即建立，不待宣傳。所以改革幣制時，往往同時凍結資金，或征課財產捐，或利用國外資源來維持過渡期間的公共開支；我們的幣制改革在幣制上是溫和的，在物價上却採取嚴峻的態度，整個原則殊有先天上的缺陷。

物物交換是原始的交易行為，也是經濟活動的基本法則；今日鄉間所持的觀念便是如此，換句話說，他們不肯吃虧。中國是私產制度的社會，價格結構不能脫離預期成本或再生產成本的因素，工商業的正常經營總以追逐利潤為目的，預期利潤決定生產的進行，這個觀念對整個社會是牢不可分的。退一步說，經濟管制即令可以使少數地區的企業甘於承受負利潤，但管制不及的鄉村則仍在例外中，農產品上漲也會打破或動搖這些地區的生產計劃。我們覺得對於既得利益階層的糾正，租稅制度永遠是一個良好有效的工具，用增溢稅收來貼補主要生產，實在比限制價格使其利益薄及社會者為完美。

更從不吃虧的原則講，政府對收兌金鈔的處置，也值得鄭重考慮。大家不妨這樣想，如果政府因為收進外匯而增加發行，則出售外匯即可緊縮發行，同時如進口物資增加，就沖淡了物資缺乏的程度。目下經營當局正在促成開放自備外匯，但我們希望非自備外匯也要放寬，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正是政府樹立信譽的要圖。以上所云，大致在說明在狹義的經濟管制之中，有許多許多事體亟待整個經濟政策的配合運用，大家若祇注意管制的成績，而不問管制的環境，就不免流於疏略。此外，軍事自然重要，毋庸細說。

(四)

我們對目下的經濟局勢不無徬徨苦悶之感，所以說來說去，祇有些空空洞洞的話語。本來，現在好像是非管制不可的局面，一旦放棄管制，投機風氣之猖獗將非任何人所能意料；但鑒於社會機構在本質上的缺陷，有時使我們不能不覺得經濟管制的範圍和成效都有某種限度，至於限度為何，初無定見，而大致說來，第一總須考慮到生產的延續與發展；第二則是必須考慮到都市與農村關係的均衡；第三有彈性的管制不至流於消極而發生窒息作用；第四任何一種新辦法要在事先計劃得十分周密，如非切實可行，如不至中途受阻，總以從慎為上。

經濟管制的範圍，其實應該包括整個人民及政府的努力與合作；光是經營當局，其效能總是偏在的，偏在即無流弊，也不能解決全盤問題。現在是兵革遍地，民生困窮，所在問題滋多，但願大家的眼光移到遠大處，長久處，不要把事情弄僵了。

# 論今後財源的籌措

甘士杰

我在「論預算平衡與幣制改革」一文中說過：「由於政府八九年來以發鈔應付支出的結果，造成今日惡性膨脹的現象，使人人對法幣所具有的信心發生動搖。結果所致，全國工商凋敝，農村破產，經濟危機日趨嚴重，政府的收入銳減。時賢論此，多以平衡預算為解決今日經濟危機的先決條件。但筆者所見，恰與此相反：如不先行改革幣制，則永不足以言預算之平衡」（見財政評論第十七卷第四期第三頁）。因為我們的通貨既已至惡性膨脹的階段，則幣值急劇地下降，物價急劇地上升。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方面政府的支出隨同比例的增多，在另一方面，政府主要的收入如租稅公債等，都已同速地作相對的減少；在這種重壓力之下，政府的預算，怎能達到平衡？基於這種認識，所以作者極力主張提前改革幣制。因為幣制既已改革，「人民自然會有新的信心；心理一趨普遍安定，物價當可穩定；政府便可趁這穩定的局面，來逐一施行各種補助的財政經濟政策，以謀配合，求達復興經濟的目的」（前揭第八頁）。

時至今日，我們所期待的幣制改革，終究實現了。在改制後的這一個多月當中，薪上固然是被凍結了，而銀行的存款逐漸增多，薪給人員的所得大半放入箱內，物價達到了相當穩定的狀態；這些事實，在在證明了人民對新幣金同券有了新的信心，既然新幣對人民發生了這種新的信心，則政府應當多多珍重，尤當設法加強了，才能繼續維持這個穩定的局面。當然，要繼續維持一個穩定的經濟狀態，方法的是很多，但最根本而又極端重要的，還是在使預算達到平衡。雖然近代各國沒有預算絕對平衡的事實（關於這點，作者已在「近代財政政策的起源及其發展」一文中詳為闡述——見實業金融第

一卷第四期），但也當接近收支平衡的狀態。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固然是極力樽節開支，而另一方面則在增加收入。樽節開支的問題非常簡單，然增加收入的問題却很複雜，每易為施政者所忽視。作者寫作此文，便是想就這個問題加以討論，藉供當局釐訂政策的參攷。

任何國家對於財源的籌措，最主要的要算徵稅募債和發鈔。這三種籌措財源的方法，在實際上并不是屬於三個截然不同的範疇；不過因為財政學者為了討論的方便，通常將徵稅募債和發鈔分為各別的部門。就這三個部門的本質來講，都是將國民所得或資產徵取一部以供國家使用。換言之，都是把國民的生產 (National Income) 或資源劃出一部歸政府支配。這種講法，是從實物的觀點來看。如果我們從實行的方法上來講，則徵稅是明白地和強迫地徵取國民所得或資產的一部分，在將來是不償還的。募債雖說也是明白地徵取國民所得或資產的一部分，但却不一定是強制的，而且在將來是要償還的。至於發鈔，在表面上絕不是由人民繳納貨幣或實物給政府，然而從實際情形上看，也是政府取得國民所得或資產的一部分支配權的方法。它的性質，也和徵稅一樣：是強制的而且是無償的。它和其他兩種辦法不同的，只在不是明白的徵收一點。關於這個緣故，所以從廣義的觀點來說，募債和發鈔，都可以算是一種稅課。

政府處理財政，和私人理財的情形不同。私人理財的最大原則，在於量入為出；至於政府，則是量出而為入。即使是量出而為入，但也自有其一定的限度。「國民所得」、「生產資源」和「國外借款」三者的總和，便是限制政府支出最高額的重要因素。在這三種限制因

素之中，尤以「國民所得」最為重要。因為一個國家無論在什麼時候總不該去消耗她的生產資源（以資本為主的生產資源）。即使當國家遇到了戰爭，國民所得不足以應付龐大的戰費，而不得不用國家資本的時候，但應該還是不得已的極例外的辦法。例如這次對日的抗戰，為的是爭民族的生存，求國家的獨立，雖逼得要支付極大的代價，但總算還是值得。若是遇到像當前的國內戰爭，則萬萬不該動用國家資本去維持它。至於國外借款，當然也很可以達到維持戰爭的目的。但外債多了，徒然促使國際收支的失衡，加重壓榨國民經濟的外力，尤其若是借得的外債不時發生作用，像過去若干次對外的借款只是肥了私囊，則其為害更烈。即使丟開這些不講，就是外債可以發生預期的作用，但也得視外交的形勢和運輸的情形（因為外債必是換成了進口的實物）如何而定。假使既不能消耗國家的資本，又不能借得外債，則政府的支出最高額，應以其國民所得的數額為限制。我在這裏所講的國民所得，自然是指從國民所得中減去最低而合理的國民消費額，生產事業的維持費（如折舊準備等）和必要的資本蓄積額等所餘的「淨所得」(Net Income) 而言。這種所謂淨所得，其數額便是政府徵稅，募債和發鈔的最高限度。

我們常常聽到人家在說：單是增稅一項，并不足以維持國家的開支，必須輔以公債的發行；同時我們也可以聽到有許有人在說：僅是增稅和募債，仍不夠政府的開支，所以還得仰賴發鈔。這種似是而非的辦法，在我們明白了前述的理由而後，便可以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論調。就我國當前的情形來說，國民的生產資源亟待開發，而外債的舉借又極難；因此，我們的國民所得額（

淨所得)，便是政府議出的最根本的限制。如果說作為財政上的支出「夠」或「不夠」，只能問我們的「國民所得」夠或不夠，而不能問徵稅或發鈔夠與不夠。既然徵稅募債和發鈔都是徵取國民所得或資產的方法，則用此三種方法中任何一種所徵取的國民所得或資產不夠支出時，假若不是國民所得或資產的總額不夠支出時，便是所用的方法不能發揮預期的效果。理財者如果純從夠與不夠的觀點來抉擇徵取國民所得或資產的方法，便是犯了極大的錯誤。因為方法上的差別，不在夠與不夠，而只在行政上的便利和它所生的影響不同。且讓筆者作進一步的說明。

先從財務行政的觀點來講，只看徵取的方法是否便利？就一般情形而言，徵稅不如募債，募債不及發鈔。所以純從財務行政的觀點去看這個問題的人，總認徵稅如有阻力（或他們所講的不夠），則應以募債相補助；如果募債又遇有阻礙（或再不夠），則祇有藉發鈔來彌補。假若徵稅募債和發鈔都只是純粹財政上的措施，不具有社會的和經濟的意義，自然可以如此辦。可是處今日而談財政措施，主要的還是若重在其所生社會的與經濟的影響兩方面（讀者欲知其詳，請參閱拙作「近代財政政策的起源及其發展」一文），至於財務行政方面，只是一個次要的問題。由此可知：近代國家之理財，每每捨輕而就重或避易以趨難，為的便是想藉財政政策為推行國家經濟政策的有力工具。

其次，我們再從對社會與經濟所生影響的觀點來說；為求明白起見，又可分兩方面來分析。第一、政府如有取之於民時，務必使其負擔公允。假使我們拿這個準則來衡量徵稅募債和發鈔，則發鈔通常不如募債，募債又恆不如徵稅。然而稅課的種類很多，故其所生的影響也就各有差異（發鈔與募債兩者情形亦然）。如果政府用發鈔的方法取之於人民，則處出的重擔每落在中下層階級的肩；至於富裕階層的人民，却反因通貨膨

脹而獲得許多暴利。如果政府不採發鈔的方法而募集公債，而公債的發行係由銀行承購用作膨脹通貨或信用的基礎，則其影響與發鈔無異；公債若由人民購買，事實上，通常以中上層的人民為主。論理，富裕階層的人民應該是公債的主要承購者，但如推銷公債不用強制的辦法，則中層階級反成為公債的主要購買者。我們一看過去我國募債的情形，何嘗有一次不是如此？若是政府以課稅的方式取之於民，則其對於社會所生的影響，又隨稅課的種類不同而有殊異。就一般情形而言，間接稅如關稅外稅貨物稅等，其最後的歸著(Incidence)大半都落在中下層人民的肩，而直接稅如財產稅所得稅過分利得稅等，主要的則是由富裕的上層階級來承擔。但是如

果從行政不便利和實施的效果來看，則直接稅不如間接稅。所以理財者為了行政上的便利和歲入上的數額，總希望捨重而就輕，依賴間接稅的徵收；然而結果總是使分配失衡，更使貧富的階級趨於懸殊；中下層人民的負擔加重，生活水準乃降至合理的標準以下。由上說來，我們如果要建立一個公平而合理的社會，便當極力使人民的負擔公允，進而求財富分配的平均；則在上述的幾種徵取國民所得或財富的辦法中，要以直接稅課的採行最為有效，合理的公債政策次之，而以發鈔及具有通貨膨脹性質的募債為害最烈。

第二、政府取用於人民，除了應注重社會公平的原則而外，還得考慮其是否對生產具有阻礙的影響。如果阻礙了生產，則會有降低國民所得的危險。若是國民所得趨於減少，便是減少了政府財政的源泉；實與殺雞取卵無異。就一般的情形來說，在發鈔或具有通貨膨脹性質之募債的初期，是有促進生產提高國民所得的功效的。所以近代英美各國每逢經濟蕭條的時候，便以發鈔或具有膨脹通貨性質的募債大刺激生產，這便是所謂「發動政策」(Pump-priming policy)（關於這點，作者在「近代財政政策的起源及其發展」一文中有詳盡的論述

，讀者可以參閱）。不過等到通貨已呈「真性膨脹」(True Inflation)的狀態而後，則其結果適得其反。我國幣制改革前的情形，正是如此。若是募債而由人民自動購買，其影響並不致於對生產有多大的影響，從而也不致對國民所得額有多大的影響；但若募債而行強迫攤派，則其結果與租稅的徵收無差異。一談到租稅，其所及於生產的影響，則遠較發鈔與募債來民複雜（讀者如欲知其詳，可參閱拙著「租稅對於生產與分配的影響」一文，載財政評論第十四卷第四期）。為了篇幅的限制，我不擬在此多加論述，祇要政府於釐訂稅制之初，周為擊劃，詳加放慮，使能完全適合客觀的實際情況；並於課稅稅額之後，猶能使生產事業保持相當的利潤水準；進而使各種生產事業因稅制之引誘與限制，作合理的緊縮與擴張。所以稅制如屬周詳而合理，不惟不致阻抑正當的生產事業，而造成國民所得減少之危機，相反地，倒可促進生產而使國民所得提高。由上說來，我們可知如欲使一國的生產事業發達，并使她的國民所得增高，則除了在某種情形下可藉溫和的通貨膨脹以達到外，但主要的却還是要靠合理而周密的租稅政策。

從上述的幾種觀點來看，政府的理財者如欲廣闢財源以謀平衡預算，則惟有藉合理而周密的直接稅課為主要的籌措方法，再輔以合理而適當的間接稅課。募債若採自動購買的方式而又具有合理的限度時，因可保存勞動人民的所得，倒也不妨同時採用。至於募債而又招致通貨膨脹，或竟以發鈔為籌措財源的方法，毋寧說是一種自殺的政策，實萬萬行不得！

作者在前面將政府籌措財源的一般方法分別加以檢討後，現在再進而討論我國的實際情形。在過去（改革幣制以前的一般時期）——我們且說「過去」，政府純以發鈔來應付國家的支出，所以造成那種可怕的惡性的通貨膨脹。在那種惡性的通貨膨脹之下，即使想盡方法，也終不能使預算平衡。因如，我們應該珍重這種食鹽

（下接第四頁）

# 南方氣候與中國種族

光軍

中國南方的氣候對中國種族實在大為不利。這是從各方面的觀察與事實得來的結論，本文將予以說明。任何智慧的民族居住於熱帶或亞熱帶都難有較北方民族健全的身心，這是由於南方的氣候使人類的有機組織逐漸衰敗之故。

中華民族血統，是從同一的世族而來，南方人與北方人既屬同一的血統，他們體格上的不同（平均高度與體重的不同）顯然是受環境的影響所致，而非由於遺傳。三十年來有二十二位醫生對中國各地區人的高度與體重曾作一集體的比較，他們測量了一萬另八百六十三人，所得到的記錄如下：北方人平均高度為一六九·二公分，平均體重為五九·八公斤，華中人士平均高度為一六五·一公分，平均體重為五二·六公斤。華南人平均高度為一六三公分，體重為五〇·四公斤。這就是說，華中人士較華北人士平均低四·一公分，較華南人高二·一公分。體重方面比華北人輕七·二公斤，比華南人重二·二公斤。總平均南方人較北方人矮六·二公分，輕九·四公斤。

在女性方面的差別也是一樣的。南方女人平均比北方女人矮六·六公分，輕四·五公斤。根據產婦科的記錄，南方女人與北方女人的骨盆也有差異，三十年來中國各地一七、三三一產婦的記錄，南方婦人與北方婦人的骨盆其直徑與體格的高矮輕重是作同一趨勢的。

在南方氣候之下，體格退化的原因何在？環境的因素如溫度，濕度，寄生蟲，細菌，食物等都是使人類有機體從各方面腐退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

南方的食物。人體骨骼是由鈣、磷與維他命D等原素所組成，如果鈣質的供給受了限制則骨骼便較小而輕了。五千年來以農為生的中國人，忘記了遊牧時代的生活習慣。以牛乳為飲料。這對於體力是一重大的打擊，因只能靠蔬菜與穀類來維持所需要的鈣質。植物是從土壤中吸收鈣質的。由於北方的雨量少，所以土壤內鈣質保留的較多，可是在南方，因雨量很多，土壤中的鈣質多被雨水冲刷而去，或到流入河中或到土壤的深處而使植物的根部無法充分的吸收。

細菌與寄生蟲在溫暖潮濕的地方繁殖很盛，南方疾病的種類較北方多得不可勝計，如瘧疾，各種種類的痢疾與熱病，傳染這些病的媒介為蚊蠅等，這些媒介南方是最宜於繁殖的。

在南方因氣候與環境的影響，易遭結核菌的滋養，一九二四年北平考恩醫師 Dr. Korn 曾對二〇四九人作結核病的檢查，結果發現六三一人有此疾，約佔百分之三〇。一九三三年上海賴醫生 Dr. Lai 在四七〇三人中找到二八二一人有結核病約佔百分之六〇。此外還有其他的病，都可證明南方的傳染病較北方為多。教育部於一九三一在四個地區舉行學生體格檢查，其記錄如下：

- 1 北京大學有一六三三學生受檢查，其中一〇九七人屬優級體格，五三五人屬於劣級。
- 2 東北大學（在東北）有一九七五名學生受檢查，其中一三三九名屬優級，六三六名屬劣級。
- 3 四川大學有一六〇八名受檢查，其中僅四九九名為優級，一一〇九名則屬劣級，約三分之一強。
- 4 中央大學一二八五人受檢查，僅有二七八名體格

屬優級，一〇〇七人屬劣級約佔四分之三強。由此看來在北方的兩個大學方格不健者僅三分之一，而在潮濕悶熱的華中兩大學劣級體格佔三分之二以上。氣候的因素造成此種狀況殆無疑議。

上節已將人體長度與重量作一比較，南方的氣候頗妨礙中華民族體格的正常發展。近來所發現唯一的矛盾現象，却是南方所產的嬰兒比北方的重而長，並且頭部較大。過去三十年中有十位醫生的記錄，九五六二名剛生的嬰兒中北方的嬰兒平均長度為四九·五公分，南方嬰兒的平均長度為五〇·七公分，南北相差一·九公分。南方剛生嬰兒的體重平均比其生產在北方的堂表兄妹重四〇·六六磅，嬰兒的頭部，南方較北方為大，其直徑比例為五與四之比。可是婦女的體格，南方人却比北方人小，因此之故，南方婦女生產比較北方婦女生產艱難而有危險。

南方嬰兒體格較大的原因，科學解釋是這樣：南方的溫度，濕度大，過份刺激人體內有機化學反應。通常每增加攝氏十度，使有機化學反應加速一至二倍。溫度對人體內的消化液（Enzymes）亦有影響，譬如，用消化液來消化蛋白質，在攝氏零度時需要時間為一百八十分鐘。可是在攝氏五十度時只需十分鐘就可將蛋白質消化了。因此我們可得一結論，就是比較熱的地域人體內消化液消化食物的能力較大而快。

南方氣候對於嬰兒死亡率影響已如上述，茲再採用趙氏及瑞氏的研究（Chau and Wright's studies）來作一解釋，在廣州醫院他們調查了二二九一個家庭，

（下接第九頁）

食物是重要的原因

食物是重要的原因



# 文 藝

## 巴爾札克的葛利奧爸爸 (續上期)

英·毛姆作  
何欣譯

### 五

巴爾札克在文學上的成功，正如其他方面的成功一樣，給他帶來許多新朋友；他的豐富的生活力，他的喜溢眉宇的好脾氣，使他除了在最為排斥外人的沙龍外，處處都是受歡迎的賓客。被他的聲名所迷住的一位高貴的貴婦是馬奎斯·得·凱斯特理 (Marquise de Castiglioni)，一個公爵的女兒，又是另外一位為英國皇室直系後裔的公爵的甥女。她用假名給他寫信，他回答她，她又寫信來說出她的本人。他去看她；他倆變得非常親密，之後他就每天去看她，她是蒼白，金髮，似花如玉，他戀愛了她。雖然她允許他吻她那貴族的手，她卻拒絕他進一步的行動，他塗香水使自己發香，他每天戴新的黃手套；但這對他並無用處，他變得不能忍耐和易怒，開始懷疑她是在耍他，事實很明顯，她需要一位崇拜者而非一位愛人，無疑她認錯地有一位已經成名的聰明的青年拜倒石榴裙下，而她無意成為他的情婦。

危急之秋在日內瓦來臨，以她的舅父費茲——魯姆士 (Fitz-James) 為監護人，他們停去意大利的路途中。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巴爾札克同馬奎斯去旅行，他卻含着眼淚歸來。我們可以假想是因為他曾做過成的要求，她以使他深深感到恥辱的態度加以拒絕，痛苦而憤怒，覺得自己已被利用了，他重返巴黎。他並不是位甚麼都不為的小說家；每種經驗，甚至是最最恥辱的，都為其寫作之源，馬奎斯·得·凱斯特理就成為

他後來所寫的高等社會的無心的薄婦的典型人物。

當他還在毫無結果地想說服這位高貴婦人的心的時候，巴爾札克接到一封從奧德莎 (Odessa) 寄來的署名「外國女人」的熱情的信，第二信，還是同樣的署名，在拆過後，又寄到了。他在唯一的一份被允許送到俄國境內的報紙上登一啓事：「M. de B. 已經收到送給他的信，他只能在今天的這份報上承認收到，但不知將回信寄往何處，頗引以為憾。」寫信的人是伊薇林娜·漢斯喀 (Evelina Hanska)，一位出身高貴的波蘭婦人，很富有。她是三十二歲，已經結了婚，但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她已經生過五個孩子，但只有一位女孩子活着。她看見巴爾札克的啓事之後，就安排好，如果他寫給她的信由奧德莎的一位書商收轉，她可以收得到，通信隨即開始。

因此巴爾札克生命中的偉大的愛情開始了。

這雙通信者的信變得越來越親密。以那時的較誇張的態度說，巴爾札克把他的心赤裸裸地寫出來以博得這位婦人的憐憫與同情。她是浪漫不羈的，她厭倦了在烏克蘭的五萬畝大平原中間的別墅中的單調的家庭生活。她崇拜這位作家，她對這個人頗有興趣，過了兩年多的信之後，漢斯喀夫人同他的健康情形頗不佳的丈夫，和她的女兒，一位管家和一些僕從前往瑞士的涅沙特爾 (Neuchâtel)；因她之邀請，巴爾札克也去那裏。他倆如何會是個個浪漫的兒聞，他在一個公園裏散步時，看見一位婦人正坐在凳子上讀書，她掉了她的手帕，在拾

起的時候他看見這本書是他的一本小說，他開口講話，那就是他來看的那位婦人。

這個時候她是位漂亮的人物，略帶幾分豐美的嬌態；她的眼睛是美麗的，雖然永遠有輕輕的一點斜視，她的髮是美麗的，她的嘴很可愛。當她第一眼看見這位肥胖的紅臉的外貌頗似屠夫的曾給她寫過抒情而悠美的信的人難免要吃一驚的，如果她果真如此，那麼他的黃金斑點的眼睛，他的豐富的生命力會使她忘記，為時不久他變成了她的情人。過了幾個禮拜他被迫非回巴黎不可，他們商量好在初冬在日內瓦再會後，他們握別了。他到那裏過聖誕節，又同度六個禮拜，在這期間他寫了「蘭基亞之公爵夫人 (La Duchesse de Langeais)」，在這本書裏他替自己報復了凱斯特理夫人給他的恥辱和苦痛。

在回巴黎之途中，他遇到一位蓋都伯尼——維斯康蒂伯爵夫人 (Comtesse Guldoboni-Visconti)。她是一位灰色金髮美人，但是驕傲而動情，一位英國籍的婦人，盡人皆知她不忠實於她那隨遇而安的丈夫，巴爾札克立刻就被她迷住了。她是客氣之至，但是這些日子的浪漫豔情指導着他倆的戀愛，就好像短篇故事之第一頁。但不久在維也納的漢斯喀夫人就聽說了巴爾札克的新迷戀女色。她給他寫了封信，頗多嚴厲之責難，在信裏她宣布她就要再回烏克蘭去。這是個打擊。他早已開始打算在她丈夫死後同她結婚，並且獲得她的財產的所有權。他借了兩千法郎，風塵僕僕趕到維也納去做和好

的談判。他以馬奎斯·得·巴爾札克之名旅行，在他行裝上帶着偽造的紋章 (Coat of arms)；還有一個隨從；這又增加了他旅行之開支，因為在他鋪設較高的機關架子之下，他必須給很多小費以顯示他假造的高貴階級。他到維也納時已囊空如洗，漢斯喀給他更多的責難，他必須力言其實不在他以前消除他的懷疑，三個禮拜後她同烏克蘭，八年間他們沒有再會面。

六

巴爾札克回到巴黎立刻就又恢復了同蓋都伯尼伯爵夫人的關係。為了她的關係他縱於更甚於往日的奢華中。因於債務他被捕了，她付出了必要的為數不少的錢使他免於囹圄之苦。自此之後，時常在他的經濟狀況陷入絕望時，她就慷慨救濟。在一八三六年，他的第一位情婦得·白妮夫人逝世，他傷痛已極，他說她是他所愛的惟一的婦人；別人說她是愛他的惟一的女人。在同一年那位金髮的伯爵夫人通知他說她已經懷了他的孩子。孩子生下來時，她的丈夫，一位寬大的人，說：「好，我知道夫人想要一位來歷不明的兒子，她得到她所要的了。」

我們可以略略提一下，即是在他的戀愛史的過程中不同的情婦們給他生了一男三女。他好像對這些孩子非常地不發生多少興趣。關於他其他的戀愛事件我只再提一個，是同一位叫做海倫娜·得·維萊 (Henriette Valette) 的寡婦的事，因為他倆之感情也是和馬奎斯·得·凱斯德理同漢斯喀夫人的情形一樣地由一封熱情的信而煽起。很奇怪的他的五件戀愛的事中有三件是由這種方法而產生的。這也許就是他們之所以不能互相認為滿意的原因。當一位婦人因為羨慕一個男人之聲譽而傾倒時，她就過份注意到因為同他的關係而使她的聲譽十倍，因而就不能有真實愛情所喚起的不懷私利觀念的幸福的事情。她是一位頑強的自我表現者，她要抓住

每一個能滿足她這種本性。同海倫娜·得·維萊的事情維持得並不久，好像是為了他向她借的一萬法朗的爭執而結束了他們的愛。

最後他久久期待的時間終於來臨，漢斯喀先生於一八四二年逝世，最後巴爾札克的夢實現了。最後他富有。最後他大大小小的債務都償還清楚。但伊薇林娜在報告她丈夫死訊的信之後接着又有一封信說她不願同他結婚。她不能原諒他的不忠於愛情，他的奢侈，他的囑咐的債務。他陷入絕望中，她在維也納時曾經告訴他不期待着他對她保持着身體上的忠實一如她據有他的心一樣長久。可是，她卻對他保守貞操，他為她的不公平而暴怒。他考慮的結果認為只有去會見她才能重得她的愛，所以，又通許多信，雖然她非常不願意，他動身到聖彼得堡去，她正在那裏，他是四十三歲而她是四十二。他們都很胖而已為中年，他的預料是對的，好像同他在一起時她不能拒絕他任何要求，他們又一度成為情侶，她答應同他結婚。

她實踐她的諾言是七年後的事，傳記家們都弄得很迷惑，為甚麼她竟延遲如此之久，但是這原因並不難推測。她是一位高貴的婦人，她以其高貴之血統而自傲；很清楚地她看到了在做一位著名作家之情婦同一位庶民之暴發戶的妻子之間有着極大之差異。她的家人一定盡最大的努力來勸說她不要同這一個不合適的結合訂立契約。她有一位已屆結婚年齡的女兒，按照她的階級和環境來安排她的婚事是她的責任。巴爾札克是一位衆人皆知的浪費者；她也可能害怕他會以她之財產而任意揮霍。他總是向她要錢。他沒有任意揮霍她的錢，只不過是向她要。她有錢但她自己也是豪華奢侈的，但把自己的錢為自己的行樂拋出去同讓別人為他的行為而扔出去之間是有區別的。

奇怪的事不在伊薇林娜就擱那麼久才嫁他，而在她終於同他結婚。在這七年中他倆時常見面，自然這些次

的會面中的一次的結果是使她懷孕了。巴爾札克為之神魂顛倒，他覺得他已獲勝並請求她立刻同他結婚；但是她，不願意在時機未到時聽別人的強迫，寫信告訴他說在她分娩之後她打算回到烏克蘭去，節省一下，以後就同他結婚。孩子生下來就死了。還是在一八四五或一八四六，她在一八五〇方同他結婚，巴爾札克同她在烏克蘭度過冬季，結婚儀式就在那裏舉行的。

為甚麼最後她又答應了呢？他的延長的勤苦的勞動最後損傷了他的強壯的體格，他的健康有個時候是衰退了。在那個冬天他曾害病，雖然他的病痊癒了，但很明顯的他不曾活得太久了。也許是她對這位雖然不太忠實而那麼久久的經常的愛她的現在是將死的人動了憐憫之心；也許是她的識悔者，因為她是位熱誠的婦人，力勸她改正她那不合習俗的處境。不論如何她同他結了婚，他們回到巴黎，在巴黎他用她的錢買了一所大房子，並且很奢侈地裝飾起來。但她已不是位有錢的婦人了，她為了她的女兒把自己大部份財產都花去了，只留了幾為數不多的年金。如果巴爾札克頗為失望，他並沒有表示出來。

這是很為哀傷地，在苦苦等待那麼久之後來提到這件事，最後他的希望實現了，但這婚姻並不是成功的。伊薇林娜使他很不幸福。他又病倒，這次他沒有復元，在一八五〇年的八月十七日他與世長辭。伊薇林娜心碎腸斷，哀傷不已，在一封給她朋友的信中寫着現在她一無所望，只求同她的丈夫到遙遠的另一個世界裏去享受；但是，她能安慰自己，因為她又成爲一個叫做詹·季谷 (Jean Gigoux) 因為長得醜而綽號成灰 (Pau-Gris) 的畫家的情人。他並不是一位好畫家。

七

從巴爾札克那多豐富的作品中選一部能代表他的小說可不容易。幾乎在所有的作品中至少有兩三個人物，

因為他們為單純的原始的感傷所窘困，都以令人難忘的力量而著名。他的力量就是完全寄於對這種人物的描寫中；在他寫到一個心理複雜錯綜的人物時，他就比較不太中庸了。幾乎在他所有的小說中都有很有力的場面，但只有少數幾部有別人的故事。我所以選「葛利奧爸爸」(Le Père Goriot) 為其代表也有幾個理由的。這本小說所講的故事是永無斷地有興味。在他的一部份小說中巴爾札克竟以談論許多不相干的事情來打斷他的敘述，而「葛利奧爸爸」則沒有這種缺點。他讓他的極其客觀地按他們的由來由他們的語言與行動解釋自己。「葛利奧爸爸」的結構嚴緊，他的兩條主線，老人為他那忘恩負義的女兒的自找犧牲的愛情，和野心勃勃的拉斯蒂納(Rastignac)在該時擁擠而腐敗的巴黎的第一步成功，巧妙地交織一起。

「葛利奧爸爸」之所以有趣也是因為在道本小說中，巴爾札克第一次有系統地應用把同樣的人物一本一本地出現的意念。而其困難則在你一定要創造些使你非常發生興趣，而你要知道在他們生活進程中，他們發生些甚麼事情的人物。巴爾札克在這方面獲得勝利地成功，以我自己來說，我以額外的高興來讀這本小說，在其中我要知道某些人的遭遇如何，譬如拉斯蒂納，我就很迫切地要知道他的未來命運。

這種方法是有益的，因為他是創作的經濟筆法，但是我不相信豐富多才的巴爾札克，是爲了上述的那種原因而依賴這種方法的。我以為是他覺得他在他的敘述上格外增加其真實性，因為在普通的情勢下，我們確已經重複了這種同相人物有着極佳的比例的接觸；此外還有，我想他主要的目的是把他的整個作品都編織在一個可領悟的統一中。他的目的不是描寫一個集團，一個羣體，一個階級，或是一個社會，而是一個時代和一個文明。他的同胞們頗為普遍的，認為法國雖然不富有甚麼災難發生，總還是宇宙之中心的偏見誤信早使他深感苦

痛了；但是也許就基於這種原因，他有自信以創造一個維色的，變化繁多的，豐富的社會，並賦予生活的明確的靈動。

但這本書是同「人類喜劇」(The Human Comedy) 相連成爲一整體的。這裏我只是論及「葛利奧爸爸」。我相信巴爾札克在當時是第一個用寄宿舍來做其故事的背景的小說家。他雖然也用過很多次，因爲這是一能作者把許多不同人物在不同之情況中，帶到一起来的一個最方便的方法，但我不相信他曾經像「葛利奧爸爸」裏這樣用過。

巴爾札克慢慢地開始他的故事。他的方法是開始於動作的環境的煩瑣詳盡的描寫。他是顯而易見地對描寫有很大的興趣，所以他時常告訴你許多你並不需要知道的一切。他永遠不會覺得該寫的才寫，不必要的則不必多寫的藝術技巧。他告訴你，他的人物看來如何，他們的氣質如何，他們的來歷，他們的習慣，他們的理想，他們的缺點；寫完了這一切，才開始來講他的故事。我們通過他自己的豐富的實質來看他創造的人物，而他們的真實性，也不是真實生活中的真實；他們是被用原色畫出來的，生動，有時是耀目，他們比普通人更令人激動；但他們生活，呼吸；我相信，你相信他們，因爲巴爾札克自己是那麼強烈地相信他們。在他的幾部小說裏描寫過一個忠實的叫做邊尚(Blanche)的醫生；在巴爾札克病危時他說：「請邊尚來，邊尚會救我。」

「葛利奧爸爸」還有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因爲在這本書裏，我們第一次遇到巴爾札克會創造的人物中的最感動人的一個；服鐸林(Vautrin)。這一典型的人物會寫過很多次，但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驚人的活現的力量，沒有這樣的令人驚服的寫實。服鐸林有很好的智慧，意志力和很強的生命力。讀者應該注意巴爾札克如何精巧地處理着提示出這個人有些陰險，而並沒有露出，直到書末他還繼續保留的祕密。他是歡樂的，慷慨的，善良

的；他是強壯的，異常聰明的，鎮定的；你不只崇拜愛他，你還同情他，但他是奇異地恐怖。你被他迷住了，正同被那野心勃勃的出身高貴的到巴黎去露頭角的年青人拉斯蒂納所迷住一樣；但同拉斯蒂納所感到的那樣，你也感覺一種本性的不安。服鐸林是個傳奇戲中的人物，但他確是個偉大的創造。

普通都同意巴爾札克寫的很壞。他是個粗俗的人（但不是他的粗俗成爲他天才的主要部份嗎？），他的散文也是粗俗的。他的文章是冗長的，矯飾的，常有很多錯。一位很傑出的文學批評家愛彌勒·法加萊(Emile Faguet)在他論巴爾札克的書中以一頁的地位來指出他的有關興味，文體，造句法和作者用錯之語言的錯誤。當然，有些錯誤是非常顯著，所以對法文沒有高深研究也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錯是顯然地令人發抖。大家都承認查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的英文並不怎樣好，一位有文化教養的俄國人會告訴我，託爾斯泰和杜思退夫斯所寫的俄文也是拙劣的。很奇怪的這四位舉世聞名的大小說家寫他們的語言都很壞，好像寫得好並不是小說家的素養的根本的部份；而更重要的卻是氣勢，活力，想像，創作力，觀察，對人類的豐富的知識，對這知識的深感興趣和同情心。雖然如此，寫得再好比寫得壞要多些。

原載大西洋月刊一九四八年一月號

(附記)：作者毛姆(Moorehead Marjama)係英國著名的小說家及戲劇家，爲英國自然主義之大師，筆鋒銳利，潑刺，揭穿英國社會之黑暗面。其代表作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等。最近他從世界著名小說中選出十部最佳小說，均冠以導言，在大西洋月刊連載。這就是其中的一篇。他用精神分析法，闡述作者之性格與其作品之關係，這種方法尚未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也許讀者感到生疏，這一篇可作一參考。

M. de B. 即巴爾札克，爲Marquis de Balzac之簡寫。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五五七號

廣告價目

本期零售金圓一角五分

代理上海市庫收付  
扶植上海市工商業

# 上海市銀行

經辦銀行各種業務  
手續簡便利息從優

總行地址：上海九江路一五號  
電話：一〇三〇四

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 敦裕錢莊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手續簡捷 服務週到

地址：上海九江路二二四號  
電話：一五五六六總機

上海市房地產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 大業地產有限公司

經營：房地產之經租及管理  
房地產之投資及買賣  
房地產之建築及設計  
其他有關房地產業務

服務忠實 管理嚴密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三四六號迦陵大樓十樓  
電話：經理室一七〇一八  
營業室一六二七二

上海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 福昌銀號

創設於民國二十年  
財政部註冊給照

歷史悠久  
信用卓著

地址：上海山東南路四十五號  
電話：八八一三  
八七二五  
八三二五

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兼儲蓄業務

★則原為意滿客顧使★旨宗為會社務服以★

紀 77 券

# 永亨證券號

代客買賣證券  
手續簡捷服務週到

地址：四川中路五〇五號  
電話：一五七二〇——一五七二六

紀 98 券

# 大昌正證券號

代客買賣證券  
手續簡捷服務週到

地址：四川中路四〇三號  
電話：一五五一六